

新突尼斯治理模式
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
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突尼斯，突尼斯市
2015年9月2日

谢谢你的热情介绍。我很高兴来到突尼斯，特别是来到这里，地中海商学院。

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会晤了埃西德总理和政府、议会的其他成员，讨论突尼斯的改革，以及这个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和安全挑战。而且我从民间团体领袖那里听说了他们工作的复杂性，从为社区提供所需服务，到建立公民与他们的民选代表之间的联系，以及倡导改革，保护青少年免受激进化影响和促进他们的公民参与。

我所看到的是，尽管突尼斯面临所有这些挑战，突尼斯在许多方面即将取得成功。突尼斯拥有的自由民间团体的历史和经验曾经被公认为是这一地区最具活力的，突尼斯在这一地区率先推进妇女权益的历史性作用，其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她对民主政治以及扩大人民经济机会的决心，这一切使突尼斯走上一条通往巩固民主的希望大道。

也许有人会说，突尼斯自 2011 年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那场革命的承诺得到了自然的履行。当本·阿里在那年 1 月逃离这个国家，西迪布济德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激发出来的要求尊严的呼声在整个中东获得响应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在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和良性治理的道路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心怀希望，那就是不会走回头路。诚然，在阿拉伯觉醒之前的暴政和停滞不前绝非自然。对于任何人，不管是这里还是任何地方，忍受别人告诉你不能想或者说你相信的东西，或是接受对于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这绝非自然。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地区政府的基础当时正在“陷入沙漠”，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2010 年所说的那样。当更加负责任的政府可能出现时，我们希望它们将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我个人的希望在 2011 年 4 月达到最高点，当时我驱车从埃及穿越利比亚东部，当时反卡扎菲起义正在进行。我停在海边小镇德尔纳，那

里的墙上涂满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上面写着温和革命的口号。一个口号写着：“拒绝极端主义。”另一个口号写着：“我们想要一个有制度的国家。”在德尔纳，在班加西，在托布鲁克，或者在那年早些时候在去的黎波里的旅途中，我没有遇到一个人想要以恐怖主义取代暴政，这些人包括我遇到的很多笃信极其保守形式的政治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认为卡扎菲和基地组织是同一个极权主义硬币的两面，并希望能摆脱任何将严酷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的人。他们希望拥有一个提供机会与繁荣，倾听他们的不满，执行和遵守法律，除此之外让他们在和平中追求自己目标的政府。那是他们的希望，而且我相信这是 2011 年在突尼斯、班加西、开罗、麦纳麦、阿勒颇揭竿而起的大多数年轻人共同的希望。

四年后，在这个地区大部分地方，这种希望还没有实现。在埃及，许多 2011 年聚集在解放广场的年轻领袖们现在正因为违反一项实际上禁止和平集会的法律而身陷囹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继续在西奈向安全部队和军队发动恐怖袭击。在叙利亚，阿萨德用大炮和空袭对付和平示威者，开辟了一条沿途堆满尸体的、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在这种混乱动荡中，一个新的恐怖主义组织诞生了。他们把大屠杀和性奴役当作功绩在社交媒体上吹嘘。在也门，一个独裁者利用宗派冲突和区域对立卷土重来，向基地组织敞开了更大的空间，也让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而德尔纳，那个我 2011 年到访过的利比亚小镇，去年被一小群极端分子接管。他们立刻开始屠杀律师、法官、公务员、人权捍卫者——任何愿意为让法治取代枪杆子统治而奋斗的人。

四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现在来评价阿拉伯觉醒的结果还为时太早，不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向一个更加未定、公正和民主秩序转型中一段不可避免的阵痛期，还是秩序的全面瓦解。但是重要性无疑已经明晰。我是这样看的：从动荡的阿拉伯觉醒中，出现了两种新型治理模式——一种是突尼斯所代表的；另一种是德尔纳所代表的。让第一种模式成功，确保第二种模式失败，这对于我们有深远的意义。

当然，把如此沉重的负担加在你们年轻的民主制度上，让人觉得这一地区如此多的希望都仰赖你们的成功，这好像不公平，特别是考虑到你们在突尼斯这里正面临的挑战。但是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今天要强调的是，这个重担同样落在帮助你们的朋友和伙伴肩上，因为你们的成功和我们息息相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同时对付两个迫切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满足那些敢于要求更好的、更负责的政府的一代人的基本经济要求。在革命前夜，突尼斯经济体系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就业，不能确保那些最弱勢的公民能够受益于发展和资源，也不愿遏制那些掌权者牺牲人民的利益，滥用自己的权力。所有这三点都在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2010 年 12 月的绝望反抗行为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今天，突尼斯致力于纠正这一点。但是，还有许多挑战等待政府解决。突尼斯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在发展、基础设施和机会方面，严重的地区差异依然存在。巴尔多和苏塞发生的袭击尤其影响到了旅游业。

我在过去三天中看到，来自各个政治派系的突尼斯领导人正联合起来，解决这些经济挑战。他们正在努力进行改革，改善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商业环境，促进贸易。美国正在帮助这一进程。

美国已经投资 6000 万美元成立突尼斯—美国企业基金，向小企业贷款和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目标是加强那些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

我们 2000 万美元的托马斯·杰弗逊奖学金项目已经资助 400 多名突尼斯人在美国的大学和社区学院学习那些对突尼斯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学科。

我们的技术援助计划正在帮助突尼斯进行改革税收、银行和海关系统，以吸引外国投资并创造一个能让企业茁壮成长，促进增长的环境。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支持两个担保总额为 9 亿 8500 万美元的主权贷款，已经帮助突尼斯政府从国际资本获得可负担的融资。今年五月，在埃塞卜西总统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将考虑总额达 5 亿美元的第三次担保，如果突尼斯需要这笔钱来支持经济增长，并推进其正在进行的改革项目。

这些步骤是对突尼斯未来成功进行的战略投资。通过这些，我们正在帮助突尼斯实现她所需的那种平衡的、包含各阶层人民的经济的发展，

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推动经济发展。

突尼斯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恐怖主义的祸害。

怎样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当执意进行大屠杀的恐怖分子一次又一次发动袭击时，怎样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民主议会、政党、法院和警察部队这样长期、复杂的工作上呢？美国知道突尼斯人今年3月在巴尔多和6月在苏塞所遭遇的伤痛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们在2011年9月11日被袭击时，我们并没有同时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你们的挑战要艰难得多。

我们也知道，当社会受到这种力量攻击时，很自然有些人会说：“现在不是考虑人权、公平审判、或者民主选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重点放在保护自己上面。”在2011年这一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很自然有些人会说：“是的，改变是必要的；是的，民主是好的；但是看一看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的情况。我们不能让那种情况在这儿发生啊。”

这种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以及对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和武装分子进行反击的决心会很容易引发反民主的反弹。这种反弹剥夺了在追踪犯罪者过程中那些被怀疑为犯罪者的合法程序。这种反弹为了对付少数人的恶劣影响而压制大多数人的言论。这种反弹将和平的政治反对派和暴力政治极端主义划等号。

在美国，我们对这种反弹也十分熟悉。在我们的9/11之后，我们改善了我们的安全、军事和情报能力，我们加强了执法机构间的协调，我们也追踪那些袭击了我们的人——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扩大了不受监管的监控。我们在未经起诉或法院的情况下将人拘押在关塔那摩。正如我们的国会参议院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所显示的那样，9/11之后的几年中，我们追踪最危险的敌人的过程中，也动用了酷刑。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而且我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比以往更强大。但是在当时，这些行动与我们的价值观不一致。每一次我们越过这些界限，每一次我们向这种反民主的反弹屈服时，都削弱了道德水准，而这些正是我们呼吁他人接受民主作法，保护人权时所倡导的。同样重要的是，每一次我们这样

做时，它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要超过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所提供的帮助。它使我们疏远了一些社区，而我们需要这些社区的合作来发现和防止恐怖行动。它模糊了一些道德界限，而如果我们想在这场斗争中占有优势，就必须维持这些道德界限。

对权力的愤懑并且不是实施恐怖主义的正当理由，但是恐怖主义的诞生正是由于那些被政府和社会边缘化的人所抱有的深深的愤懑。例如达伊沙，其崛起正是利用了逊尼派伊拉克人对十年中越来越多的教派和非包容性政府的深深不满，以及阿萨德在叙利亚的暴行所形成的真空。达伊沙给今天中东各地的年轻人，那些自 2011 年以来就在为建立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而和平抗争的年轻人传递了怎样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的方法注定要失败；你会被关进监狱；你会受到折磨；你会被噤声；什么都不会改变。相反，我们这些使用暴力的人是强大的，将取得胜利。”想像一下，这种说法会在这个恐怖分子与和平政治活动人士如今被关在同一间牢房的地区产生怎样的共鸣。顺便说一句，对于那些政治伊斯兰教的支持者，那些拒绝暴力，寄希望于民主制度和选举的人，达伊沙的信息是：“你们的做法将导致你们的毁灭；我们的做法是获胜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将和平的伊斯兰政党和恐怖分子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追随者同样对待，最终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变成一样的。

当我们向反民主的反弹屈服，当我们开始为保护我们自由的法律设立例外的法律，当我们让和平的异议人士噤声，当我们虐待被我们囚禁的人，我们让那些认为可能和平解决那些愤懑的希望黯淡无光。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当和平、民主的变革不可能实现时，就验证了恐怖主义的宣传，那就是暴力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种倒行逆施也疏远了那些我们必须仰赖其帮助来战胜恐怖主义的人。我们得到的有关年轻人离家去为达伊沙和类似的组织战斗的一些最有价值的信息来自他们的家人、宗教领袖或他们社区中其他一些人。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朋友、邻居、爱人被捕后将遭受酷刑，或者被失踪的话，谁会打电话报告警方呢？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种生存威胁面前必须保持被动。我们必须不懈地与之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在保护我们的人民和保存我

们的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这边赢，恐怖分子那边输的话，我们必须双管齐下。

那么，*我们要*怎么才能赢？

首当其冲的一条，我们必须将那些选择暴力和恐怖的人绳之以法——有时这需要动用武力。在这一点上，我们百分之百站在突尼斯人民和政府这一边。通过我们和突尼斯政府的安全合作，自 2011 年以来已经超过 2 亿 2500 万美元，美国正在加强突尼斯抗击内部和地区威胁的能力，包括反恐能力。我们确定突尼斯是主要非北约盟国，这承认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深化了我们的反恐合作。

我们的第二个途径是在社会中建立一种自由的文化，保护言论自由，让制度开放并具代表性，并确保安全机构真是要保障我们的安全，真正为所有人服务并提供保护。正如国务卿克里上个月在开罗所说：

“我们的成功取决于在当局和民众之间建立信任，让那些对官方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通过参与政治进程，找到渠道和平表达他们不同的声音。

正因为如此，我们和突尼斯合作，改善部队和社区接触的方式，防止重蹈使用酷刑的覆辙，同时帮助警察部队开发更有效的工具收集证据。我们希望反恐法律得以实施，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同时不会限制人们的权利。我们希望在透明度和问责方面，在加强民间机构方面，从议会到独立于政府的民间团体，都有持续的进步，实施真正的监督。

建立自由的文化也意味着加强民间团体的作用。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人权民间团体组织，突尼斯捍卫人权同盟诞生的地方。遗憾的是，本·阿里政权掌握了所有独裁制度通过法律手段和官僚障碍限制民间团体组织的伎俩和战术，就像这一地区其它独裁政府仍然在做的一样。

如今，突尼斯的民间团体重新获得自由。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让人们再次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指南针（Al Bawsala）这样的组织让所有突尼斯人都能自由获取议会和市政府信息。

Mourakiboun 组织中 3000 多名受过培训和认证的选举观察员 2011 年和 2014 年奔赴突尼斯各地，利用科技手段发回实时报告，向那些持怀疑

态度的人显示，阿拉伯国家公开、自由、公正和富于竞争的选举是什么样子。我们年轻人（WeYouth）这样的组织通过领导才能开发和技能培训，提升年轻人的能力，为他们参与突尼斯致力于建立的包容性经济做好准备。

民间团体也是社区在打击极端主义势力的战斗中抵抗能力的源泉。在突尼斯出现了大批专门劝阻激进化的新的民间团体组织。这些组织将青年的不满情绪疏通为积极参与和帮助家庭推进他们的政府制定更有力的法律和政策，防止突尼斯青年的加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

今天这个地区有一些人说，民间团体组织为对抗暴力极端主义而工作，这都很好。但是如果不加以控制，一个自由的社会可能会急剧进入危险。他们说，自由将极端主义势力置于政府监视和控制范围之外。他们说，过多的自由削弱社会，使社会更容易受到这种威胁的伤害。

这些人并不是很了解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不需要言论或集会自由就可以走进公共场所，开枪把人打倒。恐怖分子知道如何绕过政府设置的所有限制，知道所有那些本·阿里用来扼杀突尼斯民间团体的招数。在中东地区，每出现一位由于脸书上一个批评政府的帖子或者推特而被逮捕的博主，每出现一位由于其组织接受外国资金而被取缔的民间团体组织主管，就有 100 个真正的恐怖分子利用代理服务器和假名字的掩护，正在聊天室里悄悄地招募更多的追随者，在秘密地将一箱一箱的现金搬越国境。更重要的是，恐怖分子知道如何将政府的压抑政策融入他们的苦难的诉求之中。他们利用这些政策作为招聘工具。恐怖分子茁壮成长并不需要自由，他们在自由普照不到的地方茁壮成长。

那么谁确实需要自由？

- 青年和妇女需要自由。
- 记者和学者需要自由。
- 那些被边缘化，在经济发展或者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人需要自由。
- 那些因政府政策或腐败行为而蒙冤的人，那些寻求政治体制内部改革的人需要自由。
- 那些在他们的社区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更好的学校、更安全的街道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的人们，也正是在寻求那些可以抵消极端主义的事物的人们，他们需要自由。

- 那些温和的，和平的，拒绝暴力的，接受宽容和多样化的，认定他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应该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的人需要自由，而且他们需要并且应该在政府中有权发言和发挥作用。

突尼斯治理模式已经证明这种方式如何可以实现。突尼斯已经证明，在自由的环境下，世俗人士和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可以为了解决公共挑战的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我们看到，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在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复兴运动

（Ennahda）、突尼斯呼声（Nidaa Tounis）和其他政党加入了一个民间团体组织建立的全国对话，以包容和妥协的精神在重要的分歧问题上达成共识。他们在一部新的民主宪法上达成共识。他们同意将权力和平移交给一个过渡政府。他们一致认为必须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在选举之后，妥协和包容精神仍然继续得到发扬，他们同意支持建立一个达成共识的政府。这是突尼斯巨大的比较优势，向民主的进步，致力于政治包容，给民间团体以空间，包括实施一部在该地区最先进的非政府组织法律之一，承诺下放权力给地方社区。这些是突尼斯和这个地区众多国家的区别，使美国这样的朋友站在你们一边，最终将确保击败恐怖。因此，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必须保护民主成果，而决不能以此为理由从民主后退。

新的突尼斯治理模式是一种基于人权、政治包容和妥协的模式，其制度旨在让所有人的利益成为核心，追求这个模式比追求在另一个极端的模式要难得多。正如我们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已经看到的一样，摧毁一个国家比建立一个国家要容易得多，就像你们正在突尼斯所做的。而从叙利亚到也门，再到利比亚，许多像你们一样的人也仍然在想做这些。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看到 2011 年的承诺得到实现，建立民主，打败恐怖主义，我们就还需要一件东西，就是需要现实主义的耐心。

专制国家遗留下的问题不会使后来的民主发展一帆风顺。他们留下了空洞的制度、腐败网络和习惯、接受训练来保护国家政权而不是保护人民的安全机构，在很少或根本没有公民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学者们说，成功地从专制过渡到法治的全面民主，在最好的情况下，平均需要大约 15 年到 20 年。民主过渡对普通公民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建立民主国家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在美国，民主要求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就出来投票。我们不必考虑要亲手从头建立地方政府，重新

培训我们的警察，改写我们的法律，招募新法官，创建新政党，同时还要养家，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恐怖分子或者桶型炸弹的袭击。

在美国，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当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革命似乎已经胜利时，我们感到兴奋。我们动员起来支持革命。我们争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然后，几年后，当革命的最高预期仍然未实现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即使是最微弱的成就也没有获得，于是就回过头去保持现状，而不是为改变而进行投资和冒必要的风险。耐心并不一定意味着在中东国家接受比适用于我们自己的标准低一些的标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不公正。今天被折磨或错误逮捕的人，没有人想被告知，要等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获得纠正。我们只需要记住，每个民主国家在转型期都面临不可避免的挫折，正是需要更加努力、不放弃的一个原因，承认最终的回报可能不会过一个新闻周期就来到，甚至在一个总统行政部门任期内都没有得到，但回报是值得努力争取的，无论花费多长时间。

我们将继续与突尼斯以及这个地区所有愿为自由和法治而努力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合作。这就是我们决意表明了的耐心和承诺。你们已经证明，即使面对最严重的危险，也有可能取得进步。你们已经表明，正是因为这种危险，才有必要取得进步。这个地区和整个世界需要突尼斯模式取得成功，并且将其扩散，那样你们就不再孤立。你们正在继续为你们所选择的民主道路做出勇敢的、有时是艰难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骄傲地和你们站在一起。